

做什么，怎么做？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刘 大 年

一、为什么要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

为什么要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我们讲得很明白，是要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促进我国抗战史研究的繁荣，提高它的科学水平。七七事变50周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杨尚昆、胡乔木、胡绳等诸位同志分别写了文章。我也写过一点东西。那本书和其他论著中讲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抗日战争需要研究的理由，基本上也就是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的理由。抗日战争需要研究，但是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学会来办这件事呢？这是一个问题，应当说一说。

有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过去40多年了，今天提出来要研究它，令人费解。照此下去，许多近代现代的事情，例如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也拿来一一加以研究，那还有个完吗？对此可以简单回答：人是要靠生产劳动，靠不断创造新的环境条件来生活的，不能靠历史来生活。但是忘记或者抛弃历史不是文明社会的规则。要了解中国为什么是今天的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了解中国今后将往何处去，就要了解它过去是从何处来的，怎样来的。历史没有也不会完结，历史事变层出不穷，历史研究就不会有完

结。孔子、秦始皇人们还在研究，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凡有意义的都应当研究，就看事件的重要性如何。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那段历史过去了，在许多方面又与今天的现实存在着联系。我们强调“四个坚持”，讲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处处跟抗日战争联结在一起。加强这段历史的研究，意义明显。文化知识中包括我们民族起码的历史知识。在有些人的头脑里什么叫抗日战争，一派迷茫恍惚。这也说明推进抗日战争研究，了解我们民族这段历史的必要性。

再一种意见说，抗日战争可以研究，但北京和各地的社科院与大学历史系多半研究近代现代史、党史，也还有专门研究各革命根据地历史的，它们都能够研究抗日战争，现在又成立一个专门的抗日战争史学会，岂非叠床架屋，事出多门！这个看法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社科院、大学的历史学部门是抗日战争研究的基本阵地，那个阵地上的同志们做了许多工作，成绩俱在。但是他们各有分工，业务限于一定范围。抗日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敌人占领了半个中国，全国局势剧烈变动。各地许多情况至今没有闹清楚，材料有待于大家动手去收集。例如敌后战场情况很复杂，有的文章主要根据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零散资料作出结论，而那些资料上涉及的事实的可靠性却是很有疑问的。这就需要大家协作，深入调查。学会是全国性团体，便于从全局来推动工作。学会又是群众性团体，并非新设同类性质的实体机构。不论怎么看，都不存在叠床架屋问题。学会办得不好就自行撤消，也不影响其他的床和屋。

又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过去了，就定型了，不会跑掉，没有学会也可以慢慢研究，又不是现代化建设，要“引进新技术”，何必如此紧迫？说不紧迫，理由不能成立。档案材料要抓紧收集，不见于档案的战争亲历者头脑里的活材料更应抓紧收集。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世了，健在的人多半胡子头发也白了。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抗日战争在这些人是所见

世，在今天40多岁以下的人是所闻世或所传闻世。我们应该抓住所见世的人掌握的资料，把许多事情弄准确，留下信史。举眼前的例子，今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熊向晖同志的《周总理的魅力》一文所讲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幕，刷新了事情的面貌。以前的讲法如今需要改变。而且照熊文记载，其意义超出事件本身之外。又如杨成武同志在我们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冀中地道战，也有新的内容。冀中地道战很著名，但是恐怕很少人了解那里的地道长达一万六千里的实际状况。中国人民如何勇敢顽强与敌人进行斗争，正应该依据这类事实作出叙述。活资料更多地保存在广大的老年人中间，研究者不能不有紧迫感。

日本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学者早就提出了抓紧搜集口述资料的问题。1987年茨城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在论述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中说，现在到了战争和战后两代人共存的最后时代，要尽可能把战争亲历者的回忆、日记等第一手资料收集起来。这个工作只靠专业研究者是不够的，有待于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合作。希望中国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尽快建立一个类似新加坡那样的“文献·口述历史馆”，收集保存更多的口述资料。日本防卫研究所有一批当年日军遗留下的资料，但不许我们查阅。日中双方的档案馆应尽快公开发表这些史料，有利于南京事件的进一步研究。日本学者所说战争和战后“两代人共存的最后时代”，每天都在缩短，亲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每天都在减少。抗日战争一百年、几百年以后，也还会受到人们的研究讨论。但那时和现在的研究条件就不同了。今天的人们想要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就不能放过这“最后时代”。

为什么要研究抗日战争，以及成立这个学会有何必要，大家在今后工作中还会碰到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的这一些远不周到。请各位去发挥，好开展工作。

二、做什么，如何做

抗日战争史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做什么，如何做，已经由团体的性质作出了规定。我们的工作必须符合学会的性质。学术研究工作的领导或指导、或推动，归根到底是思想理论、研究方向上的领导或指导。学会没有这样的“法定”使命，也不具备那种地位和条件。但是学会要发生作用，就不可能离开学术研究的特点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学会要做的首先是在学术思想领导或指导上发挥某种作用。我们虽然没有“法定”的地位，团体的性质赋予了我们这种不可推卸的任务。学会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起一定的作用，那它就会失去创立和存在的大部分价值。也许有人说，道理固然不错，但悬得过高，恐怕难于达到。我认为，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一回事，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努力去加以实践又是一回事。学会是一个团体，这样的实践当然不能靠少数人，而要靠整个学会和它联系的学术界。不管哪样的少数人是很难办成什么事的。

抗日战争研究的思想理论、研究方向内容为何，如何提法，这要大家来讨论。我觉得，首先值得提出的，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和目标。要求、目标弄明确了，前进方向也就弄明确了。这里说的要求、目标，不是指搜集整理出国内外哪些资料，在国内进行何种调查，完成哪些专题研究，出版多少卷书、怎样的书等等，而是指思想理论上要求探索、解决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去提高认识，提高科学水平。这样的要求和目标，似乎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项：即一，认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民族；二，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独特重要地位。抗日战争中的一切问题，各种题目，细大不捐，中外不论，都在研究讨论之列，没有框框，更无禁区。但是到头来，应该是通过所有那些研究，总结出对我们的民族，对抗日战争与后来中国历史关系的合乎科学的系统认识。所以强调研究抗日战争，主要意义也就在这

里。

当然，对此也许有人马上加以否定，认为这样提出要求、目标实在太片面了。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重要性，自是正道。中华民族是个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时至今日还提出如何认识我们民族的问题，岂不过于妄自菲薄！而且更有甚者，抗日战争是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民族全面抵抗侵略的世界东方规模空前的战争，日本的行动竟然不放在研究目标之中，试问这算哪一门子道理呢！

道理不难讲清楚。第一，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精神力量，对于它作为一个整体的悠久存在，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真正统一的认识。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中出现过亡国论与速胜论。速胜论在事实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亡国论则像幽灵一样，时时游荡躑躅着。它们固然是表现了对敌人力量估计的错误，更主要的则是表现了对我们民族认识的错误。抗日战争以前将近一百年里，中国多次抵御外国侵略，但每次又以失败投降告终，没有例外。不少人对自己的民族丧失了信心。统治阶级被打怕了，要去依靠外国来保住自己的阶级利益。抗日战争中他们或者这样做了，或者跃跃欲试。然而经过八年抗战，中国最后取得了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完全胜利。近百年来的老规矩居然改变了。是来自哪个星球的神奇力量使那个老规矩不再灵验的，我们的民族暴露出了什么样的秘密呢？科学知识告诉人们，事物要从运动中去认识，物体只有从运动中显示出是什么，不是什么。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这个硕大无朋的物体一直处在快速运动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运动最剧烈，最迅猛，最足以显示出它的强点和弱点，显示出它的性格特征、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前所未有，前所未闻。中华儿女的鲜血使我们的民族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洗礼。不去追求提高对我们民族的认识则已，追求那种认识，抗日战争研究就必须把这个主题作为首要目标。这是为了认识历史，也是为了寻求对今天的生活的了解。

第二，抗日战争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确认抗日战争的性质，关系到研究讨论的一切重要方面。谁也不会荒唐到如此地步：撇开日本的行动来谈抗日战争研究。那么，日本的战争目的何以没有列在研究方向之中呢？理由很简单，日本进行的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个性质从卢沟桥的枪声一响——再往前算，从柳条湖的枪声一响，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于日本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无论哪种观点的中国人不怀疑，没有争议；世界上不怀疑，没有争议；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客观主义的众多历史家和广大知识分子不怀疑，没有争议。1988年日本出版的《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那部书可以充当代表。把不存在怀疑分歧的问题作为研究方向提出来，可能被看做堂·吉诃德与风车战斗，徒然留下笑柄。在关键性的地方不应给自己制造混乱和让别人目迷五色。日本的战争行动，对于抗日战争研究者来说，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自然不是说，日本在战争中的军事、政治、经济、军国主义灌输、奴化思想统治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都了如指掌了，不必研究了。不是那样。问题在于不要把关键问题上的明确和在大量具体情节上的若明若暗混为一谈。日本高层的活动有的隐而不彰，日军在华暴行还没有全部揭发出来。它们都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很显然，这里不发生基本思想理论、研究方向问题。

反驳者说：不对呵！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性质上与日本一些人的分歧、争论可谓尖锐。以前的不讲，至少自1982年发生“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以来，日本方面不断发出和发生否定那场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的议论和活动。而且不止一次的争论中，还引出双方的“外交表态”。抗日战争研究的方向中，完全有理由把这种争论分歧放进去。

争论存在，而且也并非不尖锐。但是如果以为日本一些人要求把“侵略”改为“进入”以及提出与此相关的种种，是在谈论什么学术问题，那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那些人鼓吹侵略

战争“否定论”，篡改历史，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舆论严厉批评那种行径，双方的着眼点不是在如何看待和表述过去，而是在如何对待现实和关切未来。侵略战争“否定论”反映了日本旧势力中不满足于现状，准备有朝一日重走老路的要求与愿望；我们批驳“否定论”，所关切的也正是现实关系和日本将要走向何处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去年10月，日本自民党议员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一家杂志发表谈话，说“南京屠杀事件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他是主张日本可以说“不”，即可以把自己的旨意凌驾于别国之上的政界人士。国际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则认为中国的现状导致了亚洲继续存在冷战，鼓吹日本防卫应该针对中国。他预言中国早晚要放弃毛泽东思想，“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单一的共和国，将成为国家联邦或完全分裂的国家”，也就是指望中国倒退到抗日战争以前的衰败孱弱地位上去。这些话写在作者不久以前出版的新书《新的世界秩序》上。石原、长谷川谈论的事情密切关系抗日战争的历史，他们的着眼点是在说“不”，是在直接表述他们对中日关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与希望。如果我们把这些言论看作是谈论学术问题，跟他们去争论抗日战争的性质，那岂非找错了对象，牛头不对马嘴！

科学的研究中不存在“誓约”问题。我们不去着重讨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并不等于在研究中要把它搁一边，甚至避而不谈。日本一些人的“否定论”重复到什么时候，抗日战争研究者的批驳论就会继续到什么时候。世人的社会常识终究无法违反。“否定论”给鼓吹者带来的效应，恰恰只是所希望的反面。以南京大屠杀为例，石原的谈话在美国杂志上刊出以后，读者纷纷投书刊物，指责石原篡改历史。他们说：第二次大战后，德国对纳粹战犯进行了起诉，向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支付了补偿费用。相反，日本一些人至今尚在拼命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举世周知的事实辩护，掩盖自己的罪行，并且扮演这种脚色的政界人士不止石原一个人。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则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只是

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以及东京空袭等几个事件，其他一笔带过。读者投书之多，以至杂志编者不得不在卷首来信栏中表明，“不能刊登所有的来信，实在遗憾”。不迟也不早，就在石原谈话引起舆论界注意的时候，当年德国驻华外交官罗森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在德国联邦公文图书馆波茨坦分馆发现。报告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市内残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奸淫妇女、疯狂掠夺等暴行的大量事实。罗森乘船去上海，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像山一样的平民打扮的人们的尸体”；“在郊外下关港，由于大屠杀，有约三万浮尸”。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栗屋宪太郎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外国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中最具体详尽的资料，因为是外交文件，可靠性高。中国有句俗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侵略战争“否定论”所做的就是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

“否定论”是不是因此就会接受教训，收起来不唱或少唱了呢？看来不可能。它的土壤在日本国内现实生活里面。只要我们的目标不变成为日本现实政治、经济等等的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也就没有理由被“否定论”一类喧嚷牵着走，把它列为研究的方向。这个道理是最明显不过的了。

讨论了做什么，还要说一下如何做。

做什么的要求明确了，如何做，当然主要就是做端正思想理论、研究方向的工作。学会的各项活动，例如召开年会、举办专题学术讨论会、组织调查、出版文献等，都离不开某种方向，都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导向。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办一个抗日战争研究的专门刊物。学会通过刊物提出问题，展开讨论，反映导向，促进认识。

在学术工作上，我们历来主张百家争鸣。抗日战争研究当然要贯彻这个方针。刊物又要在端正方向上发挥作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这没有矛盾吗？没有矛盾。第一，方向也就是一定的指导思想的反映。没有哪个自我封闭的思想理论能够成为科学的思

想理论。科学的思想理论必定是开放的，不断由新事物、新认识加以丰富和完善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但不能凭重复已有的认识去坚持。它需要在研究中，在各种不同认识的讨论、争鸣中去坚持。错误的导向、思想理论也不能靠别的办法克服，而要在辩论、争鸣中去克服。坚持什么方向，本身就要百家争鸣。在历史科学的整个思想理论上是这样，在抗日战争研究的思想理论上也是这样。第二，抗日战争去今未远，关系复杂。某些问题看法上不但矛盾对立难以避免，而且可能触发人们情感激动。科学问题不能靠情感去解决。这就需要百家争鸣和在争鸣中使方向趋于端正。端正的方向，必须重视发现新见解、新认识、支持一切以事实为根据的新见解与认识，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在新见解或其他什么名义下否定基本事实。第三，百家争鸣是一项阐扬真理，推进科学的方针。它讲的是认识论中的方法论。它的本质是开放的。但百家争鸣本身没有特定的导向。一旦导向不端正，走入歧途了，百家争鸣就不能发挥促进认识的方法论的作用了。前几年我们国家生活中发生的“一手软”，使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另外一种导向：反驳、歪曲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信奉形形色色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学说，一味歌颂资本主义。中国整个近代历史也随之大颠倒，鹿指为马，黑变为白。神圣的抗日战争竟然也在颠倒之列，以为抗日抗错了，不抗比抗为好。百家争鸣的开放性于是变成了非开放性。资本主义倾向的一家大鸣大放，社会主义一家差不多免开尊口。人们对此感到奇怪。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前几年独有的事情，也是当今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或正在发生、或世界历史上从来就存在的事情。由此可见，在思想理论、科学方向上要求得端正，就必须坚持百家争鸣，不能只许一家独鸣。万马齐喑，一家独鸣，就没有科学思想理论的地位，对于抗日战争研究来说，也就难以循着康庄大道行进。

学会需要承担某些学术活动的协调组织工作。我们需要有准

备地举办讨论会，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共同有关的资料，给发表研究成果创造条件。这些做起来都不容易，但要去努力。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主要依靠各地区分头去行动。例如设立口述资料馆，对日军暴行及某些活动的遗址采取保护措施，很有意义，也不难做到。关键是要抓紧时间，尽可能减少讹误，以免贻误来者。

抗日战争史的书现在出了好些部。以前我讲过这个问题，主张集中力量写一部反映中国和世界各地现有研究成果，在科学上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的著作。现在我仍然这样主张。所谓权威性、代表性自然不好由谁主观地给以规定。但有些要求是可以提出来的。这样的书要反映历史的主要过程，要表达历史的基本内容，看法不要有大的偏颇。抗日战争最根本的特点是中国全民族的对外战争。中国各族人民、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战争中出了力，也在战争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乃至重大的变化。中日两方之间、中国内部各种力量之间，有主动，有互动、被动。它们的地位作用不一样，又互相联结，彼此对应。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就是那些力量自身消长变化和彼此间联结、对应联系演变的过程。看到这个演变过程，才看到了历史的运动和它的实质。只讲中国一面，或者只讲中国内部的某一面，就必然割裂事变中不同地位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割裂它们的联结、对应关系。历史云云，就会只剩下一些漂浮在表面上的东西。详尽叙述了河流表面上的泡沫、漩涡，没有提及底下的激流，不能认为说出了河流真正的样子。抗日战争史资料浩繁，庞然杂陈。哪些是表现历史基本内容与实质的，哪些是表面文章，叙述必须有分析、抉择。有闻必录，什么都记下一笔，会被人们看做记狗肉账。分析、抉择才能有科学，才有接近实际的认识。历史叙述不能离开一定的观点看法。撰写抗日战争史是叙述我们全民族如何觉醒兴起、战胜强敌的光辉历史。民族观点在这里不能不占有特殊位置。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始终有最后谁服从谁的问题。牢

记民族观点，又作阶级分析，是我们应当采取的研究方法。真正的历史家总是思想家。他既不能成为法庭上某一方的辩护士，也不能成为裁判者。他只有分析、抉择，掌握住事变的基本内容，来表达出对它的深刻认识。台湾出版的吴相湘长达120万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在凡例中说，它是叙述中国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全面抗日的翔实记录，“让文献本身来显露当时当事人的见解，读本书的人们更可以相信不是本书编撰人的主观解释”。用当事人的解释作为编者看待事件的解释，书上确实做到了；不过所做到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的解释，全部叙述的是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活动、文告、见解和解释。在抗战中兴起的民主运动不见踪影。国民党政府中坚决主张抗战的冯玉祥、李宗仁出现在纸面上也是“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关于共产党抗战的记载，就只有在批判、否定时才出现了。一部中国全民族觉醒、战胜强敌的历史，于是成了一部国民党政府中蒋介石以外，其他人几乎无不应当受诛罚贬责的历史。恐怕读者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这是叙述了历史基本内容的记录。大陆上早几年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有内容狭窄，视野不广的。听说军事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新的抗日战争史的写作。后来居上，希望这些将要出版的新书，能够吸引招徕更多的读者。

三、学风、会风

学风、会风不必展开去讨论，作点简短解说。

学会章程上写着尊重历史，遵循科学，对学风作了扼要概括。我是赞成的。有的同志嫌要求偏低，不够味，主张写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章程上写不写上这几个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研究工作实践中能否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前几年一些刊物上连篇累牍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指为空想。查看一下它们的宗旨，又多半冠冕堂皇，戴着马克思主义的

闪光帽子。郑重其事地宣布，然后又反其道而行之，不能有比这更辛辣的自我讽刺了。再说尊重历史，遵循科学，切实做到，谈何容易。上面讲的有些抗日战争史的书，与尊重历史距离不少里程。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指它的个别观点或结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这个学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进展。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学说足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代替这个学说的指导地位。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到底是两家，即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毛泽东的话后来遭到了不少反对和责难，认为百家争鸣从此难乎为继了。我觉得所谓无产阶级一家，如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事实上也只能指这个体系，那么，这个话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除非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科学，否则，人们就无法否认它的科学地位，否认它是有资格居于指导地位的一家。所谓无产阶级、马克思的一家，当然不能理解为科学可以由谁自封或由谁赐予。它的是与非，要在百家争鸣中去实现。学会章程中载明遵循科学与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一致。所以没有写上，是表明并不以此为入会条件，抱着各种思想观点的学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使队伍浩浩荡荡。

学会会风一句话就说完了：不务虚名，多干实事。徒有其名，又何必多此一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尊自信，要有合理的信念信仰。这种自尊自信和信念信仰，必须是经过历史考验，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孔子说，“民无信不立”。照注经家的解释是，治国不可失信，失信则国不立。改换为“国无信不立”可能更加明白些。

“国无信不立”，就是说一个国家必须以大信大义鼓舞、规范众人，作为精神支柱、人格力量。这和唯意志论、精神统治一切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唯物论者反对唯意志论，坚决摒弃精神万能思想，无论哪种精神万能都不行。辩证唯物论强调意识形态在社

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今天我们国家的自尊自信，合理信念信仰，要而言之，无非来自两条：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历史又证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走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它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适用性。抗日战争史研究正是这方面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是值得大家努力以赴的。

哪个国家、民族一旦失去了自己宝贵的信念、信仰，便难免陷于动摇倾侧。殷鉴不远，就在眼前。阐述我们民族自信和合理信仰的任务不能仅限于意识形态中历史研究一隅。新局面的创造，有赖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学在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首先，我们要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成绩告慰关心这项工作的同胞，告慰学会联系的学术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